

文明自觉与历史自觉的统一

——论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史观的理论特质和实践价值*

王瑞媛 王成军**

内容提要 彭树智先生提出的“文明交往论”是一种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文明发展理论。其突出特点表现在：它是在历史唯物主义指导下提出的一种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明交往理论，它将文明的自觉和历史的自觉两者有机地统一起来。归根结底，该理论是一种具有真实意义的文明史观。“文明交往论”对于深化和拓展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具有重要作用，为彰显和不断构建中华文明交往的主体意识，从而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富有洞见的中国智慧和实践途径。深入研究“文明交往论”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 彭树智 “文明交往论” 文明自觉 历史自觉 历史意义

一 引言

彭树智先生是我国著名的历史学家，他在长期的世界历史研究中，硕果累累，特别是他提出的“文明交往论”，在学界广为传播。他认为，“文明交往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动力，是人类历史变革和社会进步的标尺，是人类文明发展的里程碑”。^① 文明的本质在于交往，文明交往的总趋势是由野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中国历史研究院重大历史问题研究专项 2023 年度重大招标项目“中东史学通史（五卷本）”（项目编号：23VLS027）的阶段性成果。

** 王瑞媛，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讲师；王成军，博士，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①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7页。

蛮走向文明，是由自发性向自觉性的演进，是由对立、对抗走向对话、合作，并进而获得文化的发展和进步。^① 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不仅具有极其丰富的文明交往的内容，而且具有科学性、真实性、系统性和实践性的特征。因此，该理论对于历史研究，特别是文明史的研究有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本文在时贤研究的基础上，将这一理论置于中西文明史发展的进程中，试图进一步探索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论”的突出特点和对中外文明史发展所具有的重要意义，为促进中国文明史研究的不断进展尽绵薄之力。

二 文明交往史观的突出特点

彭树智先生在其长期的文明史研究实践基础上，较早地提出了他的文明交往思想。“文明交往论”在中外学界关于文明的理论研究上具有许多重要突破，形成了文明交往思想系统。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史观的内容非常丰富，因限于篇幅，在此只阐述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论”最为突出的特征。

其一，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用马克思主义的文明交往史观来进行文明交往的学术研究，形成一个发达而翔实的史学理论系统。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并在这一原理指导下进行文明史的研究，可以说是彭先生历史观的理论支柱和思想前提，只需稍微留意彭先生的学术研究成果，就会发现彭先生一再强调将学术研究的理论、文明交往的理论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上。

彭树智先生认为，文明交往形成的交往力，同生产力相互作用，分别构成了人类社会进程中的横线和纵线，彼此联通，绘就了色彩斑斓的多样性历史画卷。从文明交往的角度来看，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不同性质的文明与野蛮之间的矛盾交往运动，与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水平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一起，推动着历史的前进。“生产关系从本质上说，是人们在生产和交换过程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交往关系。社会成员在社会分工体系中形成的不同地位和结合方式，

^①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36、44页。

只有通过彼此交往,才能得到维系和实现。”^①也就是说,交往是一种生产关系,在生产过程中人们对生产资料的占有、对产品的交换和分配,都辩证统一于文明交往实践活动中。此外,生产关系是社会关系的重要方面,也是人类交往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交往力和生产力一样,同社会关系和社会生活的总体密不可分。

当然,交往不仅停留于物质层面,还包括人与人之间感性的和精神层面的变换活动。不可否认,精神交往能够改变人的主观世界和人与人的精神关系,并且使精神生产的理论成果凝结成意识形态和上层建筑方面的诸多重要内容,如政治、法律、宗教、文艺、道德、科学、教育、哲学等等。这样一来,文明交往中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运动便自然上升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范畴中。总之,生产力、生产关系、上层建筑意识形态的形成和发展,既离不开物质交往,也离不开精神交往。交往在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构成了一个有联系的交往形式的序列,这种序列在不断实行新旧更替,但其内容总归于交往的直接产物——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制度文明和生态文明。^②精神交往虽是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得以建立的前提条件,但其基础却是物质交往。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说:“人们的想象、思维、精神交往在这里还是人们物质行动的直接产物。”^③

需要注意的是,彭先生的文明交往理论不仅是在马克思唯物理论指引下的研究成果,还是对马克思的交往理论进行研究所获得的重要成果。彭先生指出,马克思是从广义上来看待商业贸易的。比如,他用德文 *Verkehr* 和英文 *commerce* 来表示“交往”一词,其旨趣“就是赋予了广义性交往概念以历史性物质基础和辩证的动态内容,表明交往的历史联系,从而把交往看成是同生产力发展相伴随、以商业贸易为交换手段而建立起来的社会关系。事实说明,商业贸易不但是随着分工扩大而从生产中分离出来的经济交往形态,而且就其开放本性而论,最能反映文明交往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作用和表达交往和生产力关系发展的程序”。^④

①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5~6页。

②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16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51页。

④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16页。

不言而喻，历史唯物主义是探讨历史的思想方法论，它的突出特点在于深刻揭示历史发展的内在原因，即将世界上各种文明的交往建立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辩证的、矛盾运动的基础上，彭先生的文明交往理论所运用的方法论就是在坚持历史唯物主义思想的基础上，对文明交往深化研究的重大史学理论成果。“研究文明交往论的基本课题，不能从理论到理论，作纯抽象的探讨。以马克思主义的交往史观为指导，注重对诸多具体的史例个案作具体分析，从而得出具体的理论，是科学的研究途径。”^①

其二，坚持将文明交往的理论建立在动态的历史进程的基础上，形成一种源于文明史研究并进而能够指导文明研究的文明史观。自近现代以来，随着世界一体化的不断深入，重视各文明交往遂形成了西方学界一个重要的学术流派，这一学术流派在其研究中，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文明、文化与历史之间的联系，因而努力彰显其学术和理论的历史性。显然，这一研究倾向具有明显的合理性。典型的如德国著名的哲学家黑格尔在看到哲学在认识世界方面的某些局限性的同时，也发现了西方学界长期没有发现的历史的重要性，其名著《历史哲学》就是从哲学的角度开辟了与历史结合的先河。自黑格尔之后，西方的这一学术成为传统，并流传了下来，发展出诸多流派，但这种观点还有明显的不足，即其本身仍然是西方化的学术话语，根本原因在于其仍停留在哲学理论本身。比如，黑格尔虽然在《历史哲学》中指出了理论与历史的关系，但却没有揭示出哲学与历史之间所存在的深度的真实的联系，甚至将历史作为其理论的附属品，使历史缺乏独立性，正如恩格斯在《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中所指出的：“历史哲学，特别是黑格尔所代表的历史哲学，认为历史人物的表面动机和真实动机都决不是历史事变的最终原因，认为这些动机后面还有应当加以探究的别的动力；但是它不在历史本身中寻找这种动力，反而从外面，从哲学的意识形态把这种动力输入历史。”^② 因此，西方现代文明交往理论在不同程度上带有理论家的自我建构和解释的烙印，这样一来，探讨如何构建文明与历史二者之间的合理关系就成为现代文明交往理论的

①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总论”，第1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255页。

重大课题。

对此,彭先生站在文明交往史的根基上,对上述空洞的历史理论进行批评,并对自己的理论观点和体系进行了科学的说明。在彭先生看来,交往既是历史性的范畴,又是哲学范畴,“但从主要方面讲,交往的这种历史学的范畴是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是一个产生各种各样后果的无止境的进程。正是交往的这种历史性,所以我把交往称之为历史交往”。^①彭先生还说:“我的文明交往论的基础是世界文明交往史,而不是单纯的历史哲学。纯粹的历史哲学家往往是走极端的,否则就很难独成一派。实际上有建树的历史哲学家如汤因比等人,都是以历史个案为立足的根本。历史哲学必须和历史学相结合,并以历史个案史例研究为基础,充分注意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思维方式,把宏观研究与中观、微观研究有机地统一起来。”^②

需要指出的是,彭先生的文明交往史观是建立在大量的世界历史研究,特别是中东历史研究中文明交往的历史成果基础上的,是从具大量的历史研究中提炼而来,最终形成独具特色的“文明交往论”。

其实,彭先生对自己理论的代表作《文明交往论》的基本逻辑也进行了解析:“这部论文集反映了我思考这个问题的历程:从一个抽象的终结——‘交往’这个哲学范畴——开始;后来演变成对许多具体史例个案的分析;再从具体史例个案中综合归纳的‘文明交往’,又成为研究探索文明问题的新开端。”^③甚至,彭先生认为:“《二十世纪中东史》的修订,50多万字的一部书,其实就写了下面几个字:‘人类文明交往的历史反思。’”^④

当然,彭先生的具体且大量的世界历史研究成果众所周知,对此不再赘述。在此需强调的是,彭先生的文明交往理论与历史建立了紧密而合理的联系,既看到了两者的不同,又看到了两者的相同,将两者有机统一于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因此,彭先生的“文明交往论”不仅具有严密的逻辑性和系统性,还有文明交往史的真实性,是文明的交往理论,是理论与历史相交融的突出成果,是一种具有指导意义的文明史观。

①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401页。

②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自序”,第3页。

③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自序”,第3页。

④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331页。

其三，“文明交往论”是一种具有浓郁中国文化特色的文明交往理论。在现代全球化的背景下，世界文明史的研究和实践正成为全球化的焦点议题。在这一学术潮流中，作为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中国，理应对此学术和历史发展的浪潮发出自己的声音，建立起自身的话语体系。而彭先生的“文明交往论”正是在这一时代背景下应运而生的，其具有明显的中国意识和时代意识。具体而言，这种富含中国特色的文明交往理论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方面，“文明交往论”在文明发展史的领域提出了中国学者的观点。长期以来，在文明交往史的研究领域中，出于种种的历史原因，该研究理论方法体系长期被西方学者垄断，比如汤因比的“文明更替论”和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就是其文明理论的重要代表。虽然西方在近现代以来也出现了诸多文明史的理论体系，但在很大程度上，其观念都局限于西方文明观念的理论架构中，走向了对抗冲突的老路。因此，随着世界现代化的不断深化，西方学界也对其所持的文明观念进行了反思，因此，从对抗转向融合成为世界文明发展的普遍要求，但如何正确理解融合？如何正确理解融合和对抗在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最根本的是，应该如何正确在文明史观的指引下，进行世界文明交往的实践活动，等等，这些重要问题，则又成为学界的难题。彭先生通过他多年的理论与历史学研究，认为上述这些观点都徘徊于文明交往的两端，无法说明文明的本质。在彭先生看来，“文明冲突论”“文明融合论”等观点，只是着眼于文明交往总过程中的两个不同方面，“如果只是强调了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必然就忽视了人类文明交往的整体进程。也忽视了人类文明的双向和多向互动规律”。^①正是在此基础上，彭先生提出了他对全球化文明的理解：“全球化的根本内涵是人类各种不同文明交往的多元化和文明化。”^②显然，彭先生的“文明交往论”不仅从一个更加宏大的历史视野来研究人类历史进程中的文明史的发展问题，而且其成果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学者关于人类文明交往的新观念，代表了中国学者在文明史研究领域学术的新进展。

另一方面，彭先生的文明交往理论具有中国文化特色，他将“文明交

①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329页。

②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329页。

往论”的文明交往内容与中华文明史结合，并强调了中华文明史在世界文明发展进程中的作用。彭先生认为，世界历史上所形成的种种不同文明，常常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之间关系矛盾的根源。其实，“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和融合，构成了文明交往史上的诸多绚丽篇章。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同时在更深刻层面上预示着不同国家、不同地区和不同民族之间更多的融合”。^①但在这一历史进程中，中华文明所发挥出的独特作用却往往被西方学界忽视，在彭先生看来，中华文明既具有独特性，也具有普遍性。独特性在于中华文明是人类历史上少有的有独立起源的古文明之一，历经数千年，绵延不绝，举世罕见，形成了连续性的突出特点，^②而源自希腊、罗马的西方文明则属于断裂型的文明。中华文明的普遍性表现在，按照融通中西考古学的张光直教授的说法，“中国的形态很可能是全世界向文明转进的主要形态，而西方的形态实在是个例外，因此社会科学里面自西方经验而来的一般法则不具有普遍的应用性。我将中国的形态叫做‘连续性’的形态，而将西方的叫做‘断裂性’的形态”。^③彭先生进而指出，“断裂型文明以及那些中断了的古文明和新兴起来的各种文明，都应在交往系统中找出兴衰存亡的缘由”。^④

显然，要想真正实现世界文明的融合，作为既古老又年轻的世界文明古国——中国，其文明发展轨迹和成果理应受到现代世界文明史研究的重视。彭先生的“文明交往论”正如方光华教授所言：“彭先生的文明交往理论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他的中国特色。”^⑤此言可谓真知灼见。

三 “文明交往论”的重大历史意义

“文明交往论”这一重要理论方法不仅有着丰富的内涵，而且对于世界

-
- ①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总论”，第14页。
 - ② 彭树智先生指出：“这种连续型文明的主要根源在于它在包容和弹性结构之下持平衡状态。中华文明没有陷入极端宗教主义，外来宗教传入之后，都不那么狂热，而是变得温和，很少带有攻击性。这种包容和弹性结构，导致很多宗教观点共存。”参见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总论”，第14页。
 - ③ 张光直：《美术、神话与祭祀》，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3，第117页。
 - ④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总论”，第14页。
 - ⑤ 方光华：《历史理论与个案研究的完美统一——读彭树智先生的〈文明交往论〉》，《西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3年第3期，第176页。

文明史的研究而言，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意义。

其一，彭先生的“文明交往论”将文明自觉和历史自觉相结合，从而真正体现了文明交往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自觉的进程，历史自觉是文明交往自觉的基础。这一理论大大深化了文明交往的内容。

从文明交往的理论而言，其理论自身就具有明显的时代性，将文明的交往与历史紧密地结合起来，明显具有理论的真实性和效用性。长期以来，尽管西方在经历了长期的冲突之后逐渐意识到文明交往的重要性，但受制于其文明研究的思维范式，文明交往的理论无法真正同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进程相结合，也未能真正突破西方中心主义的观念。比如，亨廷顿认为，由于不同文明间自我意识的增强和差异性，全球化时代必然会引发文明间的冲突，这种观点所导致的结果是，文明研究本身失去了重要意义。而彭先生的“文明交往论”，突破了西方学界对文明交往的表面性研究，该理论不仅将文明的形态与世界历史紧密结合，而且将其与各个地区不同民族的历史联系起来，深刻体现了文明交往的自觉与历史自觉之间的内在联系，不仅深化了文明交往的内容，更重要的是将文明交往理论建立在坚实而客观的历史运动的根基上，以更好地发挥指导文明交往的理论研究的作用。

对于“文明交往论”在中东地区文明发展进程中的指导作用，彭先生已在其著作中有大量论述，本文将借鉴希腊和罗马文化交往的历史实例，进一步阐述这一理论的指导作用。

在西方文化史上，公元前3世纪前后出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间的尖锐冲突和融合，其成果在西方古代实属罕见。对此文化现象，西方学界进行了长期的探讨，传统的说法即罗马从武力上征服了希腊，而希腊从文化上征服了罗马。这一观念显然和真实的希腊罗马文明相互影响的全貌相差甚远，到现代之后，学界试图从两者间交往的途径进行探讨，这一研究较之于过去的简单吸收而言，具有明显的进步性，然而，其局限性在于它未能充分解释在世界古代史中，面对众多征服与被征服的文明，希腊和罗马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和共同成就的根源及其具体途径。

事实上，从彭先生的“文明交往论”角度来看，其中所贯穿的是二者间长期相互影响的真实历史进程，希腊与罗马在社会历史发展状态上的相似性与差异性，不仅为两大文明的融合提供了坚实的基础，而且使历史学

成为文明融合的突破口。

究其原因,一方面,希腊和罗马之间有着长达数百年的紧密伴随的历史进程,正是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双方文化的相互联系和文明交往得以开展。随着希腊和罗马人对各自及对方历史认识的不断深化,这种文明的融合逐渐加深,两者文明的交融成为可能。另一方面,其间波里比阿的罗马史研究,彰显了历史自觉在文明交融中的重要作用,即波里比阿从罗马史研究的角度,发现了罗马人征服希腊人,并成为地中海主人的奥秘,为希腊人和罗马人之间的文明交融拓宽了道路,并在历史的长河中,使罗马和希腊两者的文明交融取得重大成果。

显然,希腊与罗马两大文明之间的交融之所以能够取得显著成果,一方面是理性思考和探索的结果,体现了一种自觉性的文明交融过程;另一方面则是从一种非自觉的历史交融逐渐过渡到自觉的历史交融的过程。因此,希腊和罗马文明交融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文明交融与历史自觉两者的有效结合。^①

彭先生“文明交往论”中的交往过程实质上是一种历史自觉的交往过程,而历史自觉的过程同时又是一种积极的历史实践。这一观点不仅符合文明交融的本身,而且也与客观的历史真实相一致。

其二,“文明交往论”对于彰显和不断深化构建中华文明交往的主体意识具有重要意义。文明交往的过程本质上是各文明之间不断影响与建设的过程。研究的首要前提就是自身所具有的视域或自我,这种视域或自我是一种历史产物,只有具备了这一文化主体性,世界史的对话、理解和交融、互鉴在这一过程中才能真正进行。而这一文明交往内在逻辑,就使得中华文明主体的构建成为时代的迫切要求。

彭先生在《文明交往论》中指出:“在人类文明交往发达的21世纪,在不同文明的对话和合作的过程中,任何一种文明都要经受严峻的考验和锻炼。一种文明有没有生命力,关键在于有没有适应新生存环境变化的交往力。这种交往力是一种文明基因内在的生长能力,它表现在对自己文明的自尊、自信,对异己文明的宽容、理解,也表现在对异己文明的吸取、

^① 参见王成军、高延玲《前三世纪希腊罗马文化交融原因探析》,《天津社会科学》2023年第3期。

给予和对自己文明的创新。”^① 彭先生在此指出了—个民族所具有的文化 and 文明主体性在文明交往中的重要性，在彭先生看来，文明主体性是文明交往成功的基本条件。

法国现代著名的哲学家保罗·利科（Paul Ricoeur, 1913. 2. 27—2005. 5. 20）指出，“为了面对自我之外的另一个人，首先要有一个自我。”^② 世界文明史一再证明，文明交往的首要前提就是自身所具有的视域或自我，这种视域或自我是一种历史的产物，只有具备了这一文化主体性，关于世界史的对话和理解这一过程才能真正进行。因此，利科进一步指出，“只有忠实于自己的起源，在艺术、文学、哲学和精神性方面有创造性的一种有生命力文化，才能承受与其他文化的相遇，不仅能承受这种相遇，而且也能给予这种相遇一种意义”。^③ 这种意义表现在，它要求文明交往的双方最大限度地展现自己的主体视角，唯有如此，文明交往的双方才可以创造出一种新的、融合了双方视野的普遍意义。那么，应该如何正确认识这种自我或是文明交往的主体所独具的视域呢？德国现代著名哲学诠释学家伽达默尔是这样说的：“理解一种传统无疑需要一种历史视域。但这并不是说，我们是靠着把自身置入一种历史处境中而获得这种视域的，恰恰相反，我们为了能这样把自身置入一种处境里，我们总是必须已经具有一种视域。”^④ 因此，深入探讨这一问题，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从中国自身悠久而发达的文明史传统出发，同世界上不同的文明，比如同西方的文明进行交往，其结果必然会产生新的高于双方并包容了双方视域的普遍意义。

显而易见，作为具有五千年历史的中华文明，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对世界产生了深远而重要的影响，而在当前国际文化交流不断加深的大背景下，中华文明主体意识的不断构建对于世界文化交融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其构建的基本途径，则是将中国文化和中华文明置于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以体现中华文明的历史性和真实性，同时，又将中华文明置于世界文明历史发展的背景下，融会贯通于世界文化发展的进程中，在体现中国

①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22页。

② 〔法〕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286页。

③ 〔法〕保罗·利科：《历史与真理》，姜志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4，第286页。

④ 〔德〕伽达默尔：《真理与方法》，洪汉鼎译，商务印书馆，2007，第381页。

历史在世界历史中的重要地位的同时,也体现出真正的世界文明的普遍性和独特性。其实,这也正是自近代以来,我国许多优秀的历史学家长期致力于世界文明史研究所获得突出成就的必由之路,也是彭先生文明交往学术研究的深刻意义和重要启示所在。

其三,“文明交往论”为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提供了一种重要的理论、方法和实践途径。

需要强调的是,从文明自觉到历史自觉的持续探索,不仅代表了人们对文化交融认识的深化,同时显示了对文化交融过程的深入理解不应只局限于对文化交融历史的认识,更为重要的是,这种探讨应用历史视角来指导当前进行的文明交往,强调了历史与现实交往之间的连续性和互动性。马克思说:“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①

彭树智先生提出的“文明交往论”不仅具有明显的历史性,同时也展现了显著的实践特性,这种实践性主要体现在其明确而深厚的历史时代意识上,他的理论和学术目标直指21世纪这个充满剧烈变化的时代。因此,他指出:“研究人类的历史和现实问题,不可不研究文明问题;研究文明问题,不可不研究文明交往问题。文明交往是一条向前流淌的历史长河,它在面向21世纪的今天,正在成为一个新的学术领域。不论人们之间如何矛盾冲突,人类总是要在同一地球上生存发展,各种不同文明总要接触对话。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期望着通过不同文明之间的交往,架起彼此理解之桥。文明交往论正是推动不同文明之间交往相互关系的研究,成为有助于全球社会文明和谐问题的科学课题。”^②彭先生还指出:“许多人都意识到,中华民族正处于一个伟大的文明复兴时期。民族的复兴,归根结蒂是文明的复兴。在这个文明复兴的时期中,国人对文明的研究,随着20世纪80年代文化研究高潮之后,在90年代和21世纪初,已经进入了一个深入的、具体的和扎实的研究阶段。”^③

在当前这个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时代背景下,世界正面临各种集中爆发的矛盾和挑战。要解决这些时代问题,应当坚持文明交往的基本原则,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第140页。

②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自序”,第6页。

③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自序”,第5页。

促进人类对文明交往的自觉认识。在此基础上，还需要不断深化我们对“人类命运共同体”概念及其推动力的全面理解，从而更有效地应对全球性问题，推动不同文明之间的互鉴和共同发展。如此看来，彭先生所持的“文明交往论”不仅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而且也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究其原因，就“文明交往论”而言，文明交往由自发性向自觉性不断深化，其在规模上从封闭走向开放，在活动程度上从自在走向自为，而在活动范围上由民族、国家、地区走向世界，在交往基础上从情绪化走向理性化，在人际关系、族际关系、(宗)教际和国际关系的领域中，由对立、对抗的“我”走向对话和合作的“我”。^①“文明交往论”是建立在历史自觉基础上的文明自觉论。

在这一具有极其重大意义的历史进程中，不断丰富和发展这一具有中国文化特色的文明交往理论，全力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构，不仅是“文明交往论”的终极目标，也是中国学者义不容辞的历史使命。显然，真实地推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是“文明交往论”面对的重大理论课题，同时也是现代“文明交往论”所面临的现实问题，更是需要我们大力将文明交往付诸实践的时代课题，而对这一理论的探讨和实践则是彭先生倡导的旨趣之所在。

结 语

如上所述，彭先生的“文明交往论”有突出的特点，这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它是建立在历史唯物主义基础上的文明交往的理论，有突出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其二，“文明交往论”不仅是一种文明理论或文化理论，更是一种文明史观，换言之，文明交往的理论建立在大量的历史研究的基础上，是将文明的自觉理论与历史自觉研究相结合的产物；其三，它是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文明交往的理论，是中国学者基于中华文明精华提炼出来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文明交往理论。

因此，彭先生的文明交往理论具有重要意义。其一，对文明交往的研

^①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第506页。

究必须将文明自觉和历史自觉结合在一起，文明交往本身就是一个历史自觉的进程，历史自觉是文明交往自觉的基础；其二，“文明交往论”对于不断深化对中华文明主体性的理解具有重要的启示，因为唯有不断加强对自身文明主体的构建，才能更好地在世界文明的交往中获得具有积极意义的交往成果；其三，“文明交往论”在具备理论性和历史性的同时，还具有突出的实践性，这种实践性最为集中地表现在其对于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目标的积极作用上。

总之，“文明交往论”包含丰富的内容特点，它对于我们深入探讨世界文明本身具有极其重要的指导意义，用彭先生的话来说，“文明交往需要自己的哲学，需要自己本领域的文明交往史观”。^①将文明的理论和文明的历史相结合，并在现实中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不懈努力，正是彭树智先生“文明交往论”的灵魂所在。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版权所有
[责任编辑：张玉友]

^① 彭树智：《文明交往论》，陕西人民出版社，2002，“自序”，第1页。